

# 體系化的探索、建構與可能

## ——台灣報導文學理論研究綜述

張堂錡\*

### 摘 要

台灣報導文學的理論論述是與創作實踐同時並起，然而在經過半個世紀的發展後，相對於創作的熱潮與豐碩成果，理論研究卻顯得冷清而滯後，直到 90 年代後期，相關的學位論文寫作才日漸增多，但如果去掉與報導文學糾纏不清的旅行文學、自然寫作等次文類，清楚定位為報導文學研究的論文其實不到十本，這樣的成績是令人困惑且汗顏的。至於學院外的討論雖然一直有零星文章發表，但缺乏整體、系統的呈現。本文擬針對此一現象進行原因的探索，背景的分析，並觀察現有的理論論述，劃分其發展階段，評析其特色、得失與價值，最後提出未來研究的可能性。

關鍵詞：報導文學、台灣報導文學、報導文學研究

## **Systematism's Exploration, Instruction and Possibility —the Summary of Taiwan Reportage Research**

Chang Tang-chi\*

### **Abstract**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reportage in Taiwan appears together with the practical productions.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however, is relatively lagged behind compared to the flourishing practical productions. Up to the late of 1990s, the number of relative academic dissertations increases little by little. But the number of the proper academic dissertations is no more than ten if taken away the academic dissertations about traveling and some other writing. Furthermore, the social academic discussions are still lack of holistic presentation. This paper will analyze the phenomenon of Taiwan reportage research from the develop background, nowadays achievements, and its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

Keywords: Reportage, Taiwan reportage, Reportage research

---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 一、前言：起步與回眸

嚴格來說，台灣的報導文學研究才剛起步。

「起步」是個相對性的詞彙。首先，相對於台灣上世紀七〇、八〇年代在報導文學提倡、創作、發表的熱潮，相關的研究確實顯得滯後而沉寂。除了陳銘礪在 1980 年將報章雜誌上零星討論的近四十篇文章編輯整理成《現實的探索》一書外，系統的理论研究一直要到 1999 年楊素芬撰寫的碩士論文《台灣報導文學研究》才打破沉悶的局面，這部學位論文在 2001 年以《台灣報導文學概論》一名出版時的封面上寫著：「第一，也是唯一的台灣本土報導文學研究」，這句話的另一層涵義是：上個世紀的台灣報導文學研究在理論專著方面基本上是交了白卷。這樣的成績是令人困惑且汗顏的。其次，相對於中國大陸在報告文學研究方面的理論深化與成果豐碩，台灣的相關研究明顯落後與不足。大陸上從上世紀七〇年代末期開始，一批年輕學者即涉足於報告文學理論的研究，二十多年來，不論是文體論、歷史論、創作論或作家作品論，都有全方位的探索與建樹，已初步形成了較完備的理論格局。從以上這兩個角度來看，台灣在報導文學理論的體系性建構與整體性探索方面都還有極大的拓墾空間。

「起步」不盡然是個貶抑的詞彙，它更多的是對未來的期待以及可能性的追求。當報導文學在上世紀八〇年代中期，原本風起雲湧的騷動漸趨平靜以後，對此一文類進一步的思考遂在沉潛中開始，這原也是文學發展的自然現象，因為文學理論的建構是需要從大量創作文本中加以歸納分析的。在這方面作出貢獻的研究者有高信疆、李瑞騰、林耀德、鄭明嫻、向陽（林淇瀟）、須文蔚、陳光憲、陳映真等，他們比較有學術份量的研究成果，是報導文學研究初期重要的收穫，也是他們許多獨到的見識，讓報導文學研究的起步穩健而充滿活力。然而，在尚未醞釀出完備體系性的研究成果時，他們已然成為更年輕一輩學院研究人力的指導者或評論者，而年輕一輩的學位論文式的思維與寫作訓練，仍然缺乏成熟、深化的理論陳述與富創造性、新維度的見解闡釋，這使得報導文學研究在過去一段長時間內只能有積累性的成長，而未能有飛躍性的突破，這是十分可惜的。因此，不論從文類的可探掘性還是學科的成熟度來觀察，台灣目前的研究成果只能說是「起步」階段。

對於才剛發展起步的文類研究進行「回眸」式的檢視，似乎有些操之過急，然而這正是台灣「報導文學」這個邊緣性次文類的局限與困境。即使有研究者欣喜地找到楊逵在 1935 年就寫下「台灣文學史上最早的報導文學作品」——〈台灣震災地慰問踏查記〉<sup>1</sup>，也發現楊逵早在 1937 年就陸續發表了〈談報告文學〉、〈何謂報告文學〉、〈報告文學問答〉等理論性的文章<sup>2</sup>，但就如陳映真所分析的：「報導文學的進步傾向性和改造論固然不見容於反共戒嚴體制的意識形態，報導文學干預生活、改造生活的特質，自與倡言反對文學表現任何思想、內容和意義，一味追求技巧的玩弄的現代主義格格不入。自 1937 年楊逵倡導報導文學以來，由於這些特殊的時代、歷史和政治條件，台灣的報導文學的作品和理論，呈現長達三十餘年的極度沉寂、不發達和荒蕪的景況。」<sup>3</sup>這種沉寂與荒蕪的景況，一般論者均同意要到上世紀七〇年代中期高信疆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大力提倡後才開始甦醒、繁榮，並一度引領文壇風騷，然後在陳映真創辦《人間》雜誌四年，於 1989 年停刊之後，報導文學再度轉趨沉寂。換言之，報導文學在台灣的「黃金歲月」大約在二十世紀七〇年代中期到八〇年代末期，前後不過十餘年光景。面對這樣短暫的一頁「文類興衰史」，許多研究者早就迫不及待地想給予文

<sup>1</sup> 〈台灣震災地慰問踏查記〉發表於《社會評論》第 1 卷 4 號，1935 年 6 月。收入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台南：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2001 年 12 月）第 9 卷·詩文卷（上），頁 204-217。譯者邱振瑞譯成〈台灣地震災區勘查慰問記〉。須文蔚在《中央日報》副刊的「書海六品」專欄中針對此文寫了一篇〈台灣文學史上最早的報導文學作品〉加以介紹，2003 年 11 月 13 日。

<sup>2</sup> 這幾篇文章都收入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第 9 卷·詩文卷（上）。〈談報告文學〉原發表於《大阪朝日新聞》台灣版（1937 年 2 月 5 日）；〈何謂報告文學〉原發表於《台灣新民報》（1937 年 4 月 25 日）；〈報告文學問答〉原發表於《台灣新文學》第 2 卷 5 號（1937 年 6 月）。見《楊逵全集》頁 466-468、500-502、512-521。這幾篇文章原用日文發表，也都使用「報告文學」一詞，但《楊逵全集》的譯者可能是鑑於「報導文學」一詞較為台灣讀者和學界熟悉，因此將「報告文學」都譯成「報導文學」，但「報導文學」一詞是在台灣七〇年代中期以後才普遍使用，而「報告文學」一詞則在三〇年代的中國已十分流行，因此本文採用原始的「報告文學」譯名。向陽在其文章〈擊向左外野——論日治時期楊逵的報導文學理論與實踐〉（2004）中就選用「報告文學」，而陳映真可能一時不察，在其〈台灣報導文學的歷程〉（2001）一文中竟推論出：「引起人們注意的是，楊逵把法文的 reportage 同時譯成『報導文學』和『報告文學』，事實上楊逵一直使用的就是「報告文學」。

<sup>3</sup> 陳映真：〈台灣報導文學的歷程〉，《聯合報》第 37 版副刊，2001 年 8 月 18 日。

學史的定位、討論與蓋棺論定，事實上，當第一本學位論文以總結、概論式的筆調論述台灣報導文學的發展時，不難看出此文類已被納入階段文學史視閥下的思考與論斷。

當高信疆在 1978 年於政大新聞學會演講〈永恆與博大——報導文學的歷史線索〉時，他對此一文類的榮景充滿了信心；當陳銘礪於 1980 年編輯出版《現實的探索》一書時，報導文學還在文壇弄潮的勢頭上。但是，當林耀德寫〈台灣報導文學的成長與危機〉(1987)，《中國時報》因 1998 年報導文學獎的從缺而在版面上寫著怵目驚心的「報導文學死了嗎？」幾個大字時，此文類的衰退現象已經浮現，其如淺灘行舟的疲態也已盡顯，而當陳映真於 2001 年發表〈台灣報導文學的歷程〉文章時，已是在歷史的回眸中提出自己的反省思考與暗暗追憶消逝不再的理想與風光。既然此文類的創作歷程早已經可以做「回眸」式的觀察，那麼，針對已有的、剛起步的相關理論、批評、研究成果進行檢視與探討，應該不算是操之過急了。

雖然已有的報導文學研究成果，和散文、小說等龐大而成熟的理論系統相比，只能說是基礎工程，但它畢竟有著自身演進路徑的歷史，分析與檢視這段理論發生與發展的歷程，將有助於更完善地掌握報導文學研究的變化規律及其動向，也有助於從中獲得新的啟迪。大體來說，台灣報導文學研究經歷了四個主要時期：二十世紀三〇年代的萌芽期，八〇年代的豐收期，九〇年代的平靜期以及二十一世紀的深化期。以下即按照歷史發展的進程，對報導文學進行回顧性的檢視，並試圖提出一些未來發展的可能性。

## 二、〈何謂報告文學〉：楊逵的呼喚與理論的萌芽

楊逵發表於 1937 年的三篇文章不僅具有史料意義，也有理論價值，是台灣報導文學研究萌芽的標誌。1937 年 2 月 5 日發表的〈談「報告文學」〉是楊逵談報導文學的第一篇文章，文中強調「乍看之下，這種小兒科的文學好像是沒水準的文學形式，卻和社會有最密切的關係。」他從「文學的社會性」出發，認為報導文學的基礎穩固，「無疑是台灣新文學將會結出好果實的前提」，指出了此文類的重要性，同時，在關心台灣文學整體發展的考量下，他呼籲「我們必須致力於報告文學」，

因為「對目前的我們來說，連要放眼看整個台灣也似乎範圍太大。我們深深感覺到，應該從我們眼前、從我們週遭，踏實穩健地一步步邁出步伐才行。」他的這個與土地、現實結合的觀點，在接下來發表於 1937 年 4 月 25 日的〈何謂報告文學〉一文中有進一步的發揮。在該文中，楊逵首先對此一文體下了較明確的定義：「報告文學顧名思義，是筆者以報導的方式，就其周邊、其村鎮，或當地所發生的事情所寫下來的文學。」而它與一般文學不同之處有三：「第一，極為重視讀者（閱讀報導的人）。第二，以事實的報導為基礎。第三，筆者對應該報導的事實，必須熱心以主觀的見解向人傳達。」在「文學」與「新聞」、「真實」與「虛構」、「主觀」與「客觀」的對立矛盾與相容共生的概念處理上，他明確地指出：「報導文學雖然允許對事實做適度的處理與取捨，但絕不允許憑空虛構。報導文學也不能像新聞報導，不能以事實的羅列始終其事。因為缺乏作者感情的新聞報導，不算是文學。沒有讓讀者感受到作者的氣氛情感之作，絕非藝術。」可以看出，楊逵對此一文體的定義與期待都以文學為中心，並突出其與一般文學不同的特質。在第三篇文章〈報告文學問答〉中，他一開始就把報導文學置於台灣「新文學」而非「新聞學」的基本領域，並再度強調其間的差異：「新聞報導只要羅列事實就夠了，但是報告文學要作為文學的話，必須要有某種程度的形象。將某一事實或事件以生動的姿態，讓讀者深刻地印在腦海裡，這就是文學的生命。此處報導的性質和文學的性質必須渾然成為一體。」可以看出，楊逵一貫主張的是文學的本位，重視文學的結構形式，反對虛構，並且要立足於週遭的生活和土地，關懷地方與大眾。正是這樣的報導文學觀，使他在 1935 年就寫出了〈台灣震災地慰問踏查記〉、〈逐漸被遺忘的災區——台灣地震災區劫後情況〉這兩篇充滿人道關懷色彩，並且「足以光照台灣文學、歷史與社會的報導文學作品」<sup>4</sup>。

可惜的是，他想要掀起的、帶有思想啟蒙與社會革命的文學主張並沒有得到徹底的實現，陳映真分析道：「楊逵對報導文學的認識和理論，特別是放在 1937 年的時代背景下來看，是獨一的、宏亮的高音。但是回答他的，竟是漫長的沉默。1937 年以後，日本在台灣殖民統治全面

---

<sup>4</sup> 語見林淇濱：〈擊向左外野——論日治時期楊逵的報導文學理論與實踐〉，《台灣史料研究》第 23 期，2004 年 8 月，頁 143。

法西斯化，並且隨著日本侵華戰爭的展開而加劇。而逐漸強化起來的『皇民文學』風潮，使台灣新文學被迫組織到侵略戰爭體制，在嚴格思想控制和壓迫下，報導文學所不可少的思想性、傾向性、批判鬥爭性是和日帝侵略戰爭意識形態完全抵觸的。楊逵苦心呼喚和啟蒙的報導文學論終於胎死夭折，是必然的結果。」<sup>5</sup>雖然如此，在三〇年代的台灣文壇，楊逵的「報告文學」論述就能如此清楚、直接地將報導文學的定義、功能、使命及寫作手法等加以宣揚，並從理論上強調其對台灣文學發展的重要性，同時，又在《台灣新文學》雜誌、《力行報》的《新文藝》副刊上公開徵求報導文學作品<sup>6</sup>，不論在創作還是理論上，楊逵都堪稱為「呼喚台灣報導文學的第一人」。

在楊逵提倡報導文學的十年後，劉捷也在1947年2月5日出版的《台灣文化》月刊第2卷第2期中發表一篇〈關於報告文學〉，這也是早期難得的相關文獻。劉捷在這篇短文中對西方及中國興起的報導文學有簡要的歷史介紹，並主張報導文學寫作者應該「像新聞記者式的採訪」，因為要「依據事實」，但同時「作者必有強力的社會情感，沒有社會情感的描寫，它只可以說是平面的新聞記事，而不能表現出重輕濃淡。」他對報導文學有自己的定義：「報告文學作品是藝術家所寫的新聞記事，它有過濾藝術家強烈之主觀，然後以藝術之形式形象出來的。」<sup>7</sup>對報導文學的理論推介，此文雖晚，但和楊逵的文章同具史料文獻價值<sup>8</sup>。

<sup>5</sup> 同註3。

<sup>6</sup> 楊逵在1937年6月《台灣新文學》上不但發表了〈報告文學問答〉一文，同時也刊登公開徵求報導文學作品的啟事，可惜刊物只出了幾期就停刊了，沒有看到具體的創作成果。1948年10月，楊逵在《力行報》的《新文藝》第11期副刊上發表〈「實在的故事」問答〉，同時也公開徵求「實在的故事」作品，並獲得一些反應，他還寫文章評論了兩篇來稿。見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第10卷·詩文卷（下），頁259-262。

<sup>7</sup> 劉捷：〈關於報告文學〉，《台灣文化》月刊（覆刻版）第2卷2期，1947年2月5日，頁15。

<sup>8</sup> 鄭梓發表於1997年5月《台灣史料研究》第9期上的文章〈二二八悲劇之序曲——戰後報告文學中的台灣「光復記」〉，文中提到劉捷〈關於報告文學〉是「首度將此文學體裁引進戰後台灣的文壇」，由於當時楊逵的文章尚未翻譯，所以才有這個錯誤的推論。

### 三、《現實的探索》：初步的檢視與豐收

楊遠在 1937 年倡導的「報告文學」沒有得到預期的迴響與成績，一直要到 1975 年，高信疆在《中國時報》的《人間》副刊上開闢「現實的邊緣」專欄，接著又設立「報導文學獎」，有計畫地大力鼓吹並刊登一系列報導文學作品，這個文類才真正獲得廣泛的注意，並在創作和理論上有了初步的建樹。在創作上，有高上秦（即高信疆）主編的《現實的邊緣》（時報，1975）、《時報報導文學獎》（時報，1979）等作品集；在理論上，則有陳銘磻主編的《現實的探索——報導文學討論集》一書。《現實的探索》在 1980 年出版，是報導文學正處於熱潮階段的產物，也是台灣報導文學理論初步的成果展現，因為直到 1999 年才有楊素芬的學位論文出現，這本書在近 20 年的時間裡成了唯一的理論文本，其代表性不容忽視。

陳銘磻本身是報導文學創作者，缺乏學術理論的訓練，因此這本討論集只是 36 篇文章的匯編，沒有體系架構的編排，殊為可惜。書前有一篇由他執筆的序言：〈打開一個新的文學領域〉，一開始就提到，自 1975 年高信疆的提倡之後，「『報導文學』這個名稱才開始出現台灣文壇」<sup>9</sup>，這個看法其實是錯誤的。根據資料，早在 1966 年，第二屆「國軍文藝金像獎」（國防部舉辦）及「嘉新新聞文藝創作獎」（嘉新水泥和《台灣新生報》共同舉辦）就不約而同地設立了「報導文學」獎項，前者的首屆得獎作品是〈勇士們〉、〈枕戈待旦〉，後者的首屆得獎作品是鍾梅音的《海天遊蹤》<sup>10</sup>。換言之，不論是報導文學獎項或「報導文學」這個名詞都在六〇年代就已出現了。不過，或許是這些作品並未加以推廣，也或許是報導文學的普及性及特殊性尚未被「發現」，這些獎項似

<sup>9</sup> 陳銘磻：〈打開一個新的文學領域——《現實的探索》編輯記實〉，《現實的探索》（台北：東大，1980 年 4 月），頁 1。

<sup>10</sup> 長期以來，認為「報導文學」是在七〇年代中期或由時報文學獎首度設立而新創者不乏其人，例如李瑞騰的〈從愛出發——近十年來台灣的報導文學〉（《文藝復興》第 158 期，1984 年 12 月）說：「從七〇年代中期開始，『報導文學』這個文學術語開始出現在台灣的文壇」；彭家發的〈細說新新聞與報導文學〉（《新聞鏡》周刊第 263 期，1993 年 11 月 22 日）中也認為：「民國六十年代中葉之前，在台灣是聽不到這個名詞的。」又如記者徐淑卿的〈報導文學死了嗎？〉（《中國時報》第 43 版，1998 年 10 月 8 日）提到：「第一個設立『報導文學』獎項，而於七〇年代掀起紙上風雲的時報文學獎」。因此，陳銘磻的誤解並不顯得突兀。



乎未能在文壇掀起報導文學熱潮，開始正視此文類的價值並熱情投入於創作與理論場域仍得等到七〇年代中期高信疆的登高一呼。

### （一）一本專著與三場座談：理論豐富性的探掘與呈現

相應於許多年輕作家的積極參與，媒體版面的推波助瀾，相關作品的陸續結集出版，對於報導文學的討論與研究在二十世紀七〇年代中期以後開始出現，《現實的探索》正是七〇年代後半期一些關心其發展的學者、文化人士與實際參與寫作的報導文學工作者意見與經驗初具規模的呈現。編者陳銘礪在序言中坦承：「曾經也為了它的定義和型態困惑過」，而書中幾位學者的意見不一，也讓他不得不說：「報導文學究竟是一種怎樣型態的文學，到目前為止是沒有一定的看法」，因此，這本討論集的目的與功能不在於試圖解決此文體令人困惑的許多疑點，而只是將這些言人人殊、觀點歧異的文章集中呈現，「藉著這些學者、工作者的探討，報導文學能更澄明一些，意義更深一些。」<sup>11</sup>在 36 篇文章中，大約一半是討論文體特性、功能、起源的短篇評論，一半是對報導文學作家作品的採訪評介。高信疆是台灣報導文學運動的旗手，他的觀念直接影響和啟發了包括林清玄、古蒙仁、陳銘礪、李利國等報導文學的中堅寫作者，因此書中共收了三篇與他有關的文章。第一篇是在理論上為報導文學尋根溯源的文章〈永恆與博大——報導文學的歷史線索〉，在諸多有關報導文學起源的說法中，一般歸納成古代說、近代說、三〇年代說等三種，高信疆一方面主張古代說，認為中國的第一個報導文學家是司馬遷，而報導文學的濫觴是《詩經》，但另一方面，他也從西方新聞報導歷經客觀報導、綜合報導、解釋報導、深度報導、調查報導幾個階段，最後發展到「新新聞學」的歷史演變，為報導文學如何從新聞領域「向文學借火」的過程中，找到近代理論的依據與定位。他的說法涵蓋了中西古今，從古代一路論述到近代、當代，思路清晰，主線分明，可以說，後來研究者在「起源說」的探討基本上都沒有脫離高信疆的範疇。第二篇是高信疆接受李利國專訪而成的〈從擁抱自己的土地開始——高信疆先生談報導文學〉，這篇文章除了前言是李利國的說明外，全文以高信疆第一人稱的語氣敘述，從報導文學是什麼、報導文學工作者的條件，到報導文學的意義、歷史回顧等，都做了清楚的闡釋，

<sup>11</sup> 同註 7，頁 5、6。

是高信疆報導文學理論比較完整的表達。第三篇是林清玄的採訪文章〈報導文學的根與果——高信疆的心願〉，泛論式的介紹，多取材自〈永恆與博大〉。

如果扣除掉一般作家作品的訪談介紹、文學獎的評審意見，書中屬於理論層次的文章不到十篇，而且以泛論、概論、經驗論的內容為主，整體來說缺乏理論的深度與系統性。荊溪人〈泛論「報導文學」〉、何欣〈報導文學與文學創作〉、尹雪曼〈從報告文學到報導文學〉等文泛論了文體、源流、功能與寫作特色等；周錦〈新文學第二期的報告文學〉一文節錄自其《中國新文學史》一書，簡要介紹了三〇年代報告文學萌芽期的幾篇作品；朱俊哲〈現實的探索〉則主要論述報導文學的社會功能與價值；向陽〈呈現以及提出〉從社會性的角度，指出報導文學創作者「不僅欲求將一真實事件或對象呈現給讀者，也在有意無意間，提出了對於該事件或對象的遠景，來取得讀者的認可或參與。」對報導文學的功能與使命做了切中肯綮的定位。

較特別的是，編者刻意選了林清玄的〈竹筍與報導文學〉，以及讀者白冷針對此文提出質疑的〈報導文學是竹筍嗎？〉，讓我們嗅到了一絲當時不同見解間筆戰交鋒的煙硝味。林清玄透過形象化的比喻，以「竹筍」來闡發他個人對報導文學的三個理念：第一、「報導是竹筍出青的部分，文學是竹筍埋在地底的部分」，地底的是「白筍」，而「白筍」比「出青筍」更重要；第二、「報導是挖竹筍，文學是煮竹筍，兩者互為因果。」強調既要有好題材，也要有好的廚師；第三、「好的報導文學工作者不是天生的，像不是人人生而可以成好的筍農一樣。」強調要長時間經驗的累積。林清玄是散文創作者，他的看法偏向文學性，他說：「一篇成功的報導文學作品，它的文學性一定要強過報導性，在這裡，事實的時地人事物並沒有絕對的價值，人物的姓名不必全真，時地不必全真，只要反映出一個問題、一個意象、一種理念的癥結所在，便可以成為一篇優秀的報導文學作品。」這段話使讀者白冷質疑「他說人物以及人物的經歷都可以由作者幻想假設。這樣的作品，和小說還有什麼分別？」加上以挖竹筍、煮竹筍來比喻，白冷認為「風馬牛不相及」，經過一番推論，他認為林清玄「意念模糊，前後矛盾而似乎不自知」<sup>12</sup>，

---

<sup>12</sup> 以上林清玄、白冷的文章見《現實的探索》，頁95-103。

並在文末再度強調了報導文學「真實性」的必要。其實林清玄想表達的是對報導對象應進行勘察和精選，擇取有新意的材料加以深度的挖掘，同時在表現手法上不妨寬容而不自我設限的態度。這裡涉及的仍是報導文學文體本質的問題，對「真實」與「非虛構」的定義，「新聞」與「文學」的比重等，這些問題在當時所引起的熱烈討論與困惑，於此可見一斑。

不論如何，書中的每一篇文章都是早期對報導文學思索的印記，為報導文學的發生、發展做了不同角度的紀錄，在理論貧乏的年代，這本書的出現意味著對新的文學領域的墾荒與耕耘，對報導文學理論研究的深入開展奠定了良好的根基。陳銘礪作為報導文學的創作者，〈賣血人〉、〈鷹架上的夕陽〉、〈最後一把番刀〉、〈最後的妝扮〉等報導文學作品，已為他贏得不小的喝采，這本書的編選充分顯現出他對此一新興文體的真誠投入與持續不懈的關注。

除了《現實的探索》的問世，這個階段在報導文學理論探討方面值得觀察的還有以報導文學為討論主題的大型座談會，在八〇年代共舉辦了三場，分別是：1980年10月26日由文建會主辦、高雄《台灣新聞報》承辦的「文藝主流座談會——報導文學何去何從？」座談會，由沈岳主持，出席者有尹雪曼、趙滋蕃、公孫嬾、陳銘礪、李牧、胡有瑞、簡靜惠、呼嘯、臧冠華等；1982年10月22日在中國電視公司會議室舉辦的「報導文學的現況與未來」座談，這是文建會「文藝季」的活動之一，由耿修業、潘靄主持，高信疆、尹雪曼、孫如陵、周錦、徐佳士、陳銘礪、劉紹唐等23人出席；1987年3月7日在《文訊》月刊編輯部舉辦的第二場「當代文學問題討論會」，由李瑞騰主持，與會者有林耀德、古蒙仁、李利國、心岱、陳銘礪、潘家慶。這三場座談之後，類似的較大型的討論會要到2001年才出現，整個九〇年代似乎不再把目光注視這個逐漸失色的文類上，分析其原因，主要與1988年1月1日報禁解除，報紙增張，副刊優勢不再，報導文學逐漸失去媒體寵兒的地位有關。參加座談者多來自新聞界與文學界，特別是具報導文學寫作經驗者也在受邀之列。由於報導文學的理論尚缺乏一致的共識，對此一新興文體的定義、源流、特性、功能等仍存在著莫衷一是的分歧現象，三場討論的意見不免流於各陳己見，但在理論起步階段，這些不同觀點的衝撞與交流還是為理論的充實與發展做出了一定的貢獻。

這個階段報導文學面臨的困境，以及理論方法的不足，高信疆在「報導文學的現況與未來」座談會上的發言較具代表性，觸及的層面較廣，提出的問題也都能切中問題核心，例如在學院教育方面，他提到文化大學中文系文藝組和新聞系分別創設「報導文學」課程，但遺憾不久就取消了，因此，「基於我們對報導文學的期待，我們希望學術界能夠重視這一個問題，無論新聞系或中文系，都應該加強、加重有關它的教育和研究。」他進一步呼籲：「我們今天並沒有一個報導文學的正式團體，是不是我們也可以結合一些同道，創立一個『報導文學學會』的組織呢？我們是不是也該有一本探討報導文學理論與實際的刊物呢？」至於既有的創作成果，他也不滿地指出其瓶頸：「在題材上，過分的貴遠而抑近，重奇特而疏忽了平凡的事物；在表現上，則浮面的涉獵多，深沉的掘挖少；有的是資料多而消化不了，有的是根本忽略了資料的搜集與印證。有的太冷靜，像一篇論文；有的又太熱情，混亂了報導的主體……而更多的是，抓不住他所報導事物的內在肌理，掌握不住它們的意義，無法說出事件以外更深刻、更久遠的恆久諦旨。」作為台灣報導文學最重要的推手，高信疆的評論是一針見血且又語重心長。對於報導文學方法論問題，他也提到：「今天的報導文學不但沒有它足以依恃的理論，也缺乏相關的方法的研究。而史學研究法、社會學研究法、人類學的田野調查……都可以補充它的不足並有所發揮。」<sup>13</sup>他的感慨、觀點與期待，基本上代表了八〇年代台灣報導文學理論研究的中心與方向。

由於報導文學的新穎性與不確定性，這三場座談會所觸及的議題大部份關注的焦點仍集中在文體論的辨證、創作論的探索、歷史論的溯源以及未來發展的可能性。在文體論方面，主要討論「新聞」與「文學」的對立統一，「主」與「從」的矛盾，文體的功能與使命等，如李明水〈從新聞學觀點探討所謂的「報導文學」〉、葉建麗〈淺談報導文學的屬性〉、趙寧〈水火同源〉、盧幹金〈因時代而生，為時代而作！〉、潘家慶〈社會責任·報導文學〉等；在創作論方面，主要討論「光明面」與「黑暗面」的題材爭論，作家「心態」與作品「型態」的分析，如劉毅夫〈報導文學之我見〉、陳銘礪〈報導文學的兩面觀〉等；在歷史論方

<sup>13</sup> 以上高信疆的說法均見其在「報導文學的現況與未來」座談會上的發言，以〈試探·問題與可能〉為題收錄於文建會：《中華民國 71 年文藝季座談實錄》（1983 年），頁 432-437。

面，主要探討與西方「新新聞學」、三〇年代中國興起的「報告文學」間複雜的關係，如楊月蓀〈淺談報導文學寫作〉、尼洛〈淺析「報導文學」〉、尹雪曼〈論報導文學的寫作〉等；在未來發展方面，有馬驥伸〈如何提高報導文學的水準〉等。

值得一提的是，《文訊》所舉辦的討論會是由林燿德提交論文〈台灣報導文學的成長與危機〉，再由古蒙仁、李利國等人針對論文提出質疑與意見交流。林文是一篇綜論式的作品，從名詞的界定、台灣發展的情形、與「報告文學」的差異比較到文體本質的矛盾、自身背負的危機等，都做了精要且有創見的梳理與析論。透過不同背景、不同區域、不同時段的對照比較，林燿德對台灣報導文學做了大體上符合實情的觀察與歸納，對於林清玄、古蒙仁等的報導文學觀也提出了他的見解與批評，表現出一定的思辨能力，例如林清玄的「竹筍論」，他認為這將「使得報導文學塗抹上了一層玄學色彩，但卻無法拭去報導文學作品實證上的危機。」從方法論上，他也指出「在同一文學體裁中報導語言和文學語言之間的結合顯然是一大難題」，這是報導文學本質上的矛盾，許多的爭議均由此而生。林文同時列舉報導文學所面臨的六項「普遍缺憾」：過度的適用性、氾濫的抒情性、牢固的意識形態、浮誇的說教心態、因襲的舊觀念、難產的新生代，均能切中問題的要害。

## （二）單篇論文：多重視角的借鑑與觀察

從七〇年代中期到八〇年代末期的理論豐收期，除了以上一本專書、三場座談外，還有幾篇單篇論文值得一提。李瑞騰〈從愛出發——近十年來台灣的報導文學〉發表於1984年12月1日《文藝復興》第158期，論述了七〇年代中期到八〇年代中期近十年間台灣報導文學發展的概況，介紹了高信疆與報導文學興盛的原因，強調七〇年代台灣文化界普遍存在著覺醒與理性的批判精神，加上新聞事業的空前發展，為報導文學的蓬勃發展提供了條件，同時又以「台灣本土現實的探索」來概括這十年的創作主流，而文末對報導文學界新生代如林清玄、古蒙仁、翁台生、陳銘礮、李利國、邱坤良、徐仁修、馬以工等八人的推介，也有為這十年報導文學發展的成績做階段性總結的意味，全文以「愛」為題，基本掌握了此一新興文體的特質。尹雪曼〈報導文學與報告文學〉發表於1989年4月《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第22卷第4期，以中外報導

文學的興起與代表作品介紹為主。尹雪曼對名稱的分析頗有見地，認為「導」比「告」深入，如果報告文學是平面的，報導文學就是立體的，有「指導」、「引導」的意思，而報告文學僅著重於某一事件或某一人物的說明。在西方，不論新聞界或文學界都沒有「報告」與「報導」之分，都是 reportage，但尹雪曼主張報告文學可稱為 reportage，報導文學則應稱為 feature，「因為我們主張的，或理想中的報導文學，文學性要勝過新聞性，而主觀性也絕不低於客觀性。因此，相當接近於『專欄』與『特寫』。『專欄』與『特寫』，英文上都可以 feature 這個字來代表。」他的說法對報導文學名義的釐清可以提供一些不同的思考。陳飛龍的〈論報導文學——兼談司馬遷的史記〉發表於 1979 年 12 月的《國立政治大學學報》第 40 期，算是較早的一篇學術論文，他認為「報導文學原本是土生土長的，也就是所謂的『道地土產』。」沒有必要去「貼用外國商標」，而且報導文學之所以令我們產生「親和力」和「好感」，正足以說明「報導文學在我們的傳統文學中，不獨真正的出現過，而且，它是根深柢固、源遠流長的。」然後他就從《史記》中舉例取材加以論證，得出「太史公實在道道地地的是一位撰寫報導文學的高手」的結論<sup>14</sup>。這個觀點當然會令人聯想到前一年（1978）高信疆在〈永恆與博大〉中所提出類似的說法。高信疆將《史記》視為報導文學源流的見解，顯然影響了許多人，詩影的〈《史記》是報導文學初論〉即是一例。此文發表於 1989 年 8 月《文藝月刊》第 170 期，對《史記》何以是報導文學作了析論，主要論點有二：「報導文學非虛構文學，所報導之人或事，必須是事實。《史記》的內容合乎此。」；「報導文學須有作者自我的表現，即『有限度的筆鋒自由』、『有限度的筆鋒感情』等等，《史記》一書也都具備。」這些論點和陳飛龍的論文相近，而且基本上都是高信疆〈永恆與博大〉的延伸與發揮。

以散文理論研究見長的鄭明嫻，對報導文學理論的研究也致力甚深，在 1987 年 4 月舉行的第一屆「科技整合研討會」上發表〈報導與文學的交軌——報導（告）文學初論〉，接著 7 月舉行的「抗戰文學研討會」上又發表〈三、四十年代報告文學論〉，同時在其初版於 1987

---

<sup>14</sup> 見陳飛龍：〈論報導文學——兼談司馬遷的史記〉，《國立政治大學學報》第 40 期，1979 年 12 月，頁 178、194。

年2月的《現代散文類型論》中也有一節專論報導文學，可以說，她是八〇年代學界對報導文學研究致力最多的一位。〈報導與文學的交軌〉主要討論「報導與文學寫作的分立性」，認為「這是三、四十年代的理論家及創作者從來沒有意識到的。在台灣被提出來，是因為對新聞寫作更進一步的研究以及文學理論的發達而產生科技整合的一個難題。」她主張應從語言角度來破除這個問題，但她也承認「目前我們幾乎找不出文學與報導語言都很平衡穩當的作品」，因此，她呼籲「我們應該調和報導文學的危機，發展新的方法論，才能整合溝通文學與新聞間的橋樑。」<sup>15</sup>此文指出了許多問題的癥結，對解決之道也有一些想法，可惜僅在結尾匆匆敘述，未能進一步申論。此文與林耀德〈台灣報導文學的成長與危機〉同時發表，但兩人都未提及陳映真於1985年創辦的報導文學雜誌《人間》，則有研究者對此表示不解<sup>16</sup>。至於《現代散文類型論》中的〈報導文學〉一節，因為側重討論結構的類型，因此鄭明嫻依據「報告者參與報導客體的狀況」將報導文學分成兩類：直接經驗的報導文學（也稱經驗式）和間接經驗的報導文學（也稱考證式），並舉了一些文例加以說明。在間接經驗的報導文學範疇界定上，她主張基於「報告人處於彙整資料及查訪考證的立場」，因此「田野調查報告、口述文學與通訊稿的彙編也都可以歸納入報導文學的範疇」<sup>17</sup>。

以上這幾篇論文有的從創作現象立論，有的追溯歷史源流，有的從科技整合角度提出看法，有的討論文體分類，不同視角探討與思索的成果，顯示了這一時期對台灣報導文學理論的充實成熟所做的努力。

<sup>15</sup> 鄭明嫻這篇論文在第一屆「科技整合研討會」上宣讀後，發表於《台灣新聞報》的《西子灣副刊》，1987年4月16、17日。後收入其《當代文學氣象》（台北：春暉，1988年4月），再收入《現代散文現象論》（台北：大安，1992年8月），改題為〈新新聞與現代散文的交軌〉。本文所引出自《當代文學氣象》一書。

<sup>16</sup> 楊素芬在《台灣報導文學概論》第3章就指出：「還有另一個奇怪的現象，林耀德、鄭明嫻兩人的論文發表於1987年，陳映真創辦以報導文學及攝影為主的《人間》雜誌，在1985年11月創刊，兩人的論述文章均不曾提到《人間》雜誌，照理說《人間》作為一份完全以報導文學為主的專門性雜誌，應佔有一席之地，林耀德、鄭明嫻兩人有默契似的隻字不提，這樣的遺漏相當怪異，顯示文評家所關注的僅集中於某一時期的特定作品。」

<sup>17</sup> 見鄭明嫻：《現代散文類型論》（台北：大安出版社，1987年2月），頁258。

#### 四、〈報導文學死了嗎？〉：創作沉潛、理論沉寂的九〇年代

當 1989 年 9 月《人間》雜誌黯然停刊之際，事實上正意味著七〇年代中期在台灣掀起的報導文學熱潮已經逐漸消歇，曾經引領文壇風騷的榮景已經不再，報導文學在台灣黃金時期也已然過去，從這個角度看，1990 年出版、由陳銘礪編選的《大地阡陌路——台灣報導文學十家》也就有了文學史的階段意義。作為台灣報導文學第一個選本，陳銘礪對此文類的持續用心明顯可見。他在編者的序言中說：「我希望藉著他們十位的十篇作品，讓讀者略窺報導文學發展近十五年來的成就之一斑。」現在看去，這十位作家及其作品確實有一定的代表性，代表了創作蓬勃期的突出表現。值得觀察的是，序言中花了不少篇幅討論「光明面與黑暗面」的問題，這是報導文學寫作者在題材選取上面臨的困擾，序言中引用荊溪人、何欣、黃春明、尹雪曼、高信疆等不同見解來申論，最後指出：「道德與良知，是文學創作的的基本知識，報導社會陰暗面，不以建設、改善或喚醒人心為著眼點，勢將污衊社會，破壞文學本質；報導社會光明面，如若阿諛超過真實，那將使我們的社會陷入不忠不義、虛假無知的境地。」<sup>18</sup>對如何在二者之間求取平衡做了清楚而適切的註腳。

和前期創作的蓬勃繁榮相比，九〇年代雖然在《聯合報》、《中國時報》兩大報的文學獎仍設有報導文學獎項，中國文藝協會的文藝獎章和中興文藝獎章、中山文藝創作獎等也有報導文學類，但不容否認地，整體的創作聲勢已日漸下滑，前期的代表作家如林清玄、古蒙仁、馬以工等人均淡出此一行列，在創作發展上步入了瓶頸與低潮的沉潛期，一直到 1998 年第 21 屆《中國時報》的報導文學獎竟然全部從缺的震撼，正如張大春所言：「是一個重大的遺憾和警訊」，他相信這個挫折「正是此間文學表現及創作活動的一個集體性衰退的癥狀」<sup>19</sup>。記者徐淑卿對此做了一個聳動標題的報導：「報導文學死了嗎？」令人訝異、震驚不已，

<sup>18</sup> 見陳銘礪編：《大地阡陌路——台灣報導文學十家》（台北：業強，1990 年 9 月），頁 8。此書於 2000 年 9 月易名為《台灣報導文學十家》。這裡的「十家」是指：心岱、古蒙仁、李利國、林清玄、徐仁修、馬以工、陳銘礪、睦濤平、翁台生、楊憲宏。

<sup>19</sup> 張大春：〈尋找發現的刻度——對報導文學獎從缺的說明〉，《中國時報》第 37 版，1998 年 12 月 23 日。



而決審會議紀錄的標題「驟然消逝的雷聲」，則給人不勝唏噓之感<sup>20</sup>。相對於創作的沉寂，理論研究也隨之沉潛，到 1999 年為止的十年間，相關論文不到十篇，且都以回顧性質的探討為主，這是否預示了才興起的報導文學就已急速沒落了？我們知道，文學理論的建構必須從經典或大量創作文本中加以歸納分析，只有持續性的創作才能提供文學理論成長的養分，雖然在媒體經濟奧援不再、網路媒體興盛的困境中，由各縣市主辦的地方性文學獎徵文活動對培養報導文學寫作的新生代具有積極的鼓勵意義，與社會／社區運動結合也使報導文學找到一條新的出路，但寫作熱潮的消退、閱讀人口的銳減、題材的枯窘、獎項光環的褪色等，確是不爭的事實，如此一來，理論研究的貧乏自是合理的現象。

楊素芬在《台灣報導文學概論》中說，至 1999 年為止，單篇論文方面僅有四篇，而且九〇年代只有一篇，這個論斷過於草率<sup>21</sup>，雖然成績不盡令人滿意，但至少九〇年代就有以下幾篇相關論文具有一定的學術價值。彭家發的〈細說新新聞與報導文學〉與蔡源煌的〈報導文學與新新聞〉同為探討文類源起的文章，彭文雖不長，但指出台灣報導文學的源起主線有二：抗日時期報告文學、反越戰興起新新聞。他強調「新聞體的困境舉世皆然」，對於報導文學定義的莫衷一是，他認為是使發展陷入瓶頸的主因，因此建議「改名」或能突破困境，例如「紀實文學」、「新聞文學」，或者基於兩岸三地的文學整合，不妨統稱為「報告文學」，這些建議應該有進一步討論的空間<sup>22</sup>。蔡文的理論性強，針對美國「新新聞學」的興起與發展做了詳盡的說明，並反省台灣報導文學在受到「新新聞學」啟發鼓勵的同時，似乎未深究其寫作方式的一些局限，例如美國「新新聞」的作者寧可稱自己的作品是「非虛構小說」，當「面對新

<sup>20</sup> 徐淑卿：〈報導文學死了嗎？〉，《中國時報》第 43 版，1998 年 10 月 8 日。〈驟然消逝的雷聲〉是第 21 屆時報文學獎報導文學類決審會議紀錄，由陳大為記錄整理，《中國時報》第 37 版，1998 年 12 月 23 日。

<sup>21</sup> 楊素芬在《台灣報導文學概論》第 74 頁中提到，至 1999 年為止，單篇論文僅有四篇：李瑞騰〈從愛出發〉（1984）、林耀德〈台灣報導文學的成長與危機〉（1987）、鄭明姍〈報導與文學的交軌〉（1987），以及須文蔚〈報導文學在台灣〉（1995），顯然不符事實。

<sup>22</sup> 彭家發是政大新聞學者，此文發表於《新聞鏡》周刊第 263 期，頁 30-33，1993 年 11 月 22 日。在文中他說，要解決報導文學的諸多問題，「關鍵性問題，似乎首在文體定義及『名稱』方面，則回過頭來，思考一下『改名』的可能性，或許可收舉重若輕之效。」

聞界的指責，這些作家就標榜自己的作品是小說，而非報導；面對文學評論家的排擠，他們則反過來強調歷史事實和新聞性。」因此，他主張用「主觀的寫實」來詮釋較為恰當，因為要求作者毫無預設立場，做到「零度詮釋」並不容易，但若只是「徒託報導的形式」，刻意「突顯作者的立場」，那也是「無可救藥的單薄」<sup>23</sup>。對於報導文學的本質與創作手法問題，此文所論一語中的。

須文蔚發表於 1995 年的〈報導文學在台灣，1949—1994〉，對報導文學的源起、衝擊、爭議與式微、展望，做了全面的介紹與評論，雖然無法深入，但觸及的都是此一文類無可迴避的核心議題。該文較有新意的是拈出報導文學的兩大「爭議」：第一、「強烈的目的性」，「違背了文學所強調的藝術自主與創意，違背了新聞或社會研究所強調的客觀與真實，而使它招致各方的責難。」但須文蔚認為「上述的責難似乎忽略了報導文學的特殊性格」；第二、「方法論的欠缺」，解決之道是「以一套新的標準來詮釋這個新文類」，「要在方法上找出報導文學的出路，無庸膠著於『文學』與『報導』，乃至於『主觀』與『客觀』的對立，論述的重心應當轉向社會研究方法論的領域，思索報導文學特有的地位。」他認為社會學研究中的民俗誌法（ethnography）將會是一套「具有效度的方法和理論」，有助於「提升作品在資料蒐集與印證事實的確實與深刻」。基於這樣的認知，他在文末呼籲：「理論界應當拋棄單純援引附會純淨新聞寫作的標準，才有可能鬆開報導文學創作者的束縛，還原此一文類原始的面目。」<sup>24</sup>此文精準掌握了一個獨立文體的特性，也能在現象剖析之外，提出可行的方法論，發表以來，受到不少後來者的引用與討論。楊素芬曾質疑其強調「1949-1994」，但「細看全文卻找不出從 1949 年開始的線索」，文中所參酌的報導文學作品也幾乎都是 1987 年之前，「完全忽略了報導文學的寫作發展是動態在前進的，而不是靜止於前十年的黃金期。」<sup>25</sup>對於《人間》雜誌的忽視就使這篇以斷代視角的討論為主的論述顯得不足。

<sup>23</sup> 蔡源煌：〈報導文學與新新聞〉，《當代文化理論與實踐》（台北：雅典，1996 年 9 月），頁 63-74。

<sup>24</sup> 須文蔚：〈報導文學在台灣，1949-1994〉，《新聞學研究》第 51 期，1995 年 7 月，頁 121-141。

<sup>25</sup> 楊素芬：《台灣報導文學概論》，頁 75-76。

鄭梓發表於 1997 年 5 月《台灣文學史料》第 9 期的〈二二八悲劇之序曲——戰後報告文學中的台灣〉，對戰後台灣初期報導文學的史料蒐集與解讀很下了一番工夫，爬梳了所謂「光復元年」期間兩報（《民報》、《台灣新生報》）、兩刊（《新新》雜誌、《台灣文化》月刊），以及兩位來台採訪新聞的記者（特派員）李純青、蕭乾筆下的報導文學作品，讓我們回到當年現場，感受歷史實況，並對當年的政治悲劇有所省思。作者並不企圖界定報導文學，而是以寬泛的報導文學認知進行史料的分析，認為這些作品「至少在形式及內涵上皆已為那個鉅變的『光復元年』遺下了既寫實又藝術的多元見證」<sup>26</sup>。尤其李純青將近一個月的全島旅行、採訪，相繼撰成的〈台北一月〉（又名〈台北散記〉）、〈二十三天的旅行〉（又名〈在愛國熱潮中訪問台灣寶島〉）等七篇報導，以及蕭乾距離二二八事件僅月餘的報導〈冷眼看台灣〉，都是筆冷心熱的出色報導文學作品。鄭文述多論少，對史料的處理細膩且能掌握重點，像這樣的論文對報導文學的深化研究是很有助益的。

陳光憲對報導文學的研究、教學多年，也寫了許多相關的論文，發表於 1999 年 8 月《市立師院應用語文學報》創刊號上的〈二十世紀報導文學的回顧〉，回顧了世界、中國與台灣報導文學的興起、發展，並對二十世紀具有代表性的相關名作加以評析。全文主要集中在世界報導文學部份，中國與台灣部分則相對薄弱。他將世界報導文學分成戰爭報導、災難報導、內幕報導、社會事件報導四類加以介紹，內容詳盡豐富，但台灣部分只有三頁簡要的介紹，不過，他將台灣報導文學作品依題材分成六類：成功人物的歌頌、國家建設的描述、戰地生活的報導、鄉土文化的關懷、弱勢族群的關懷、生態環境的關懷，有自己的觀察與歸納。此外，陳映真發表於 1996 年 1 月 6 日至 9 日《聯合報》第 34 版的長文〈台灣文學中的環境意識〉，雖然是以生態環境意識的探討為主，且論及散文、小說，但其中一節專談報導文學，主要討論女作家心岱《大地反撲》和《回首大地》這兩本報導文學作品的環境意識，兼及馬以工、韓韓兩人。陳映真認為，直到今天報導文學的定義還是曖昧不明，「這主要是因為在台灣文壇一直未見眾所公認，影響深廣的報導文學典範性

<sup>26</sup> 鄭梓：〈二二八悲劇之序曲——戰後報告文學中的台灣「光復記」〉，《台灣史料研究》第 9 期，1997 年 5 月，頁 48-81。「光復元年」是指 1945 年 10 月 25 日（即「光復節」）起，至 1947 年春二二八事件爆發前的年餘期間。

作品。」因此，「一直到今天還普遍存在著無法區別深度報導、新聞特寫、專題報導這些篇幅較長，敘寫比較深入生動的新聞寫作與報導文學的具體差異的問題。」從這個角度看，陳映真認為心岱的作品「正好可以看出文學環境比較特殊的台灣，報導文學如何先從新聞寫作逐漸另結新胎而緩慢成型的過程。」在作家創作論的背後，其實有著陳映真一以貫之的報導文學理念。

這六篇直接或間接觸及台灣報導文學的文章，在近十年的時間裡顯得孤單而寂寥，九〇年代創作的式微以及評論研究的沉寂，兩者互為因果地宣告了報導文學的高峰已過。它曾經是文壇矚目的新寵，如今卻被冷落於主流之外，安守於邊緣一隅，做著猶如困獸之鬥的轉型努力，前景如何，很難令人樂觀。對於研究者而言，則似乎覺得對此一文類「蓋棺論定」的時刻已經悄然到來。

## 五、《台灣報導文學研究》：理論的總結與深化

從理論上對風光不再的報導文學進行總結與深化的嘗試，在上個世紀結束的時刻應運而生。學院內的學位論文開始將視角朝向報導文學。繼第一本學位論文之後，至 2005 年止，相關的學位論文幾乎是以一年一本的速度出現，這和一般零星、單篇的發表型態迥然不同，雖然學位論文多半未能正式出版，但其系統、深入、專論的研究成果仍值得參考。在資料的整理、議題的開發、作品的解讀與歷史意義的詮釋上都有著令人眼睛一亮的出色表現。

作為「第一，也是唯一」出版的台灣報導文學研究專著，楊素芬的「起步」是成功的。這本約二十萬字的《台灣報導文學概論》（原名《台灣報導文學研究》）在熟悉報導文學發展的李瑞騰教授指導下，不迴避關鍵但難解的問題（如文類界定、特徵的分析等），對歷史線索也做了必要的勾勒（如三種源流說、台灣報導文學興盛的原因與思潮演變等），同時在資料的爬梳掌握上花費不少心力（如對相關文學獎資料的彙編、大事年表的呈現等），在文本解讀與現象論述上也都要言不繁地重點探討（如對寫作題材的分類研究等），整體來說，已能從點到面地窺見出報導文學在台灣二十餘年間發展的重要現象。更可貴的是，在佔有資料的基礎上，她能有自己的歸納與觀點表達，例如在寫作方法論方面，她

提出四點：向新聞學借火、向歷史學求佐證、田野調查找線索、照相攝影窺真相，條理分明，具參考價值；能從社會、媒體與文學思潮三方面來論述興盛的原因，符合此一文類的特殊性與現實性。全書對相關議題本身及周邊的細節都能擇其大要地關照與論析，由於這是第一次系統而具體地研究台灣報導文學的理論著作，走向系統，就成為這部著作最重要、最有價值的特徵。楊樹清在序言中則肯定此書「在『報導』與『文學』的模糊、弔詭、爭議、不確定地帶，提供了一個較具包容性的對話、討論空間。」<sup>27</sup>不過，作為一本「概論」性質的專著，其不足也是顯而易見的，如對早期文獻的掌握不足（楊達、劉捷等理論資料未見），源流說、題材分類介紹過於簡要（西方報導文學有哪些代表性的作品應該略加提及），《人間》雜誌的重要性未被突出，以及理論論述的相對欠缺等，都是尚待開拓的空間。

楊素芬畢業於中央大學中文研究所的碩士論文《台灣報導文學研究》完成於1999年，第二年7月，由張雙英教授指導、劉依潔撰寫的東吳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人間〉雜誌研究》完成，這份專論《人間》雜誌與創辦人陳映真理念的學位論文，擺脫過去台灣報導文學研究過多集中於高信疆與《中國時報》的模式，探討了《人間》雜誌創刊的背景與過程、陳映真在《人間》雜誌中表現的媒體觀點與實踐方式、《人間》雜誌中的主要題材與涵義、時代性與世界觀等，對於1985年11月創刊到1989年9月停刊的《人間》雜誌，做了開放、整合、批判性的評介與論述，填補並強化了解嚴前後台灣報導文學發展的現實情況與文學史意義，對之前許多論文疏略的提及或浮光掠影式的評論，本論文的價值不容忽視。尤其是第五章討論《人間》的時代性與世界觀部分頗有可觀。在時代性上，作者指出《人間》一方面結合鄉土文學運動發展歷程中的三項主流：回歸本土、左派階級意識和台灣文學本土化，另一方面也沿襲了《文季》集團那股強烈的社會意識與批判風格，在融合傳統理念之後，又能突顯獨特的面貌，可說是一份思想狀態非常複雜的刊物；在世界觀上，指出《人間》「在處理任何題材時，均會詳加思考國家、政治、經濟、被殖民等因素與陳述主題間的關聯，並會參酌國際情勢予以分析，因而在報導作品中展現出台灣『中心——半邊陲』的被殖

---

<sup>27</sup> 楊樹清：《台灣報導文學概論·序》（台北：稻田出版公司，2001年9月），頁18。

民性格。」《人間》「在本土化與國際化兩者界線逐漸消融的八〇年代，既沿襲了臺灣文學傳統中寫實、反帝的台灣意識，也吸納了第三世界反殖民的論調」<sup>28</sup>，從而建構起其獨特的世界觀。《人間》雜誌是陳映真人格力量、人文理念、媒體觀點、報導文學觀的具體實踐，全部 47 期中都可以感受到陳映真堅持的信念，這一點在論文後面所附錄的〈陳映真訪問稿〉中也能得知。這部論文當然也存在著一些缺失，但在刊物定位、創辦理念與實踐結合的掌握上都有不錯的成果。

由陳光憲教授指導的台北市立教育大學應用語言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有兩部：林秀梅的《台灣原住民報導文學作品研究》(2001 年 6 月)和張明珠的《〈中國時報〉與〈聯合報〉報導文學獎得獎作品研究(1978-2000)》(2004 年 6 月)。前者共分六章，主要從文本解讀入手，依寫作內容題材的不同分成原住民處境作品、傳統民俗作品、尋根作品、社會問題作品四大類、共 14 篇作品逐章介紹評述，涉及的作家有浦忠成、曾月娥、王蜀桂、鄧相揚、劉還月、古蒙仁、陳銘礪等十餘位，分析方式稍欠變化，論述少而背景資料多；後者也是六章，但不論資料、架構與書寫都較前者出色，但探討「台灣報導文學發展的時代背景」不出楊素芬論文的內容，對「兩報報導文學獎的創設與演變」則敘述條理井然，對發展狀況的觀察也有己見，如「時報報導文學獎」的發展如同人生，有生（出發）、老（停辦）、病（從缺）、死（消失），而「聯合報報導文學獎」雖是「從平穩中求成長，仍抵不過社會的快速變遷及報導文學的式微，終究還是走到了盡頭。」<sup>29</sup>論文的重心擺在第四、五章得獎作品的析論，分成教育類、原住民、生態環境、醫療關懷、生活人文、民俗歷史、城市風貌、海外作品八類，其中以原住民 14 篇最多，海外（包括大陸、泰棉、非洲）13 篇次之，最少的是生活人文類的 6 篇，較特別的是，文本析論過程中不時有對標題、語句、修辭的分析，這或許和「應用語言文學」研究所的訓練有關吧。

蔡豐全畢業於政治作戰學校新聞研究所的碩士論文《國軍文藝金像獎報導文學獎得獎作品分析》(2002 年 5 月)，由林元輝教授指導，大

<sup>28</sup> 參見劉依潔：《〈人間〉雜誌研究》(東吳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 年 7 月)，頁 87、91。

<sup>29</sup> 張明珠：《〈中國時報〉與〈聯合報〉報導文學獎得獎作品研究(1978-2000)》(台北市立教育大學應用語言文學研究所，2004 年 6 月)，頁 95。

量採用表格方式整理資料，幾乎是以資料的介紹為主，其優點是對過去研究者長期忽略的這個獎項進行了詳細的搜羅與分析，指出其特殊背景下的特殊表現型態與成果，甚具參考價值，但全篇敘述凌亂，目次安排與一般學術論文的習慣略有出入，看不出論文的構想與突顯的重心，頗為可惜<sup>30</sup>。謝明芳《當代台灣報導文學的興起與發展》是2003年6月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的碩士論文，陳章錫教授指導，共分六章，除緒論、結論外，分別探討「報導文學之源起」、「報導文學的角色定位」、「報導文學的分期」、「報導文學的發展」，架構與內容都不離楊素芬的論文，開創性不足，雖然在其結論時有自覺地提到：「綜觀台灣報導文學的研究面向，仍然將重心放在理論基礎之探討，反而忽略了整體的論述，是為缺憾。」但事實上，整體概論性的介紹並不缺乏，理論基礎的探討才是應該致力的重心，如能有所突破或深化，才有研究的價值。至於結論的建議：「未來如能針對兩岸之間的報導（告）文學的差異性，做出分析與探討，相信對此等文類的具體研究成果將會更為豐碩。」<sup>31</sup>這項建議很快就有所落實，吳薇儀2005年畢業於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的碩士論文《兩岸當代報導文學比較研究（1976—2004）》即是首部將兩岸當代的報導文學發展、現況進行比較分析的作品，從發展歷程、文本創作到理論批評都做了詳盡的比較研究，文末的附錄有兩岸報導文學大事紀、重要作家生平簡介及獲獎篇目資料匯編，都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作者的企圖心不小，對兩岸相關的資料也盡力蒐羅，當然不免落入「詳台灣、略大陸」的困境，同時對具體文本的分析比較稍嫌不足，但觸角廣、視野寬，知難而進的勇氣還是值得肯定的。其結論所條列的十點異同，涵蓋了文學現象、思潮、傳播、網路、創作世代、題材取向、篇幅結構、藝術表現、理論視角、批評特色等，具有參考價值<sup>32</sup>。

<sup>30</sup> 論文共分五章：一、緒論；二、文獻探討，但所論卻是報導文學的歷史、軍中的文藝工作推展、文學獎相關理論探討；三、研究方法之使用及介紹，有歷史分析法、類型分析法、敘事分析法、深度訪談法、訪談簡表；四、資料與作品分析，本章對得獎作品類型、敘事及訪談資料進行分析，看似正要進入正題，卻接著就是最後一章的結論。70幾張表格穿插文中，不免顯得凌亂。

<sup>31</sup> 以上謝明芳的結論見其論文《當代台灣報導文學的興起與發展》第126頁。

<sup>32</sup> 以藝術表現及美學特質為例，吳薇儀的結論是：「台灣報導文學重在敘事，表現手法較為單純，反觀大陸報告文學，借鑑小說、散文、電影文學等多種文體的藝術方法，顯現出豐富多彩的創作面貌。台灣報導文學較多展現了真實美，而大陸報告文學則

在學位論文方面，還有一部東華大學民族發展研究所的碩士論文《原住民報導文學與原住民運動之聯繫——從公眾行動的角度探討報導文學的社會功能》（2004年7月），須文蔚、孫大川兩人共同指導，作者陳震將報導文學視為原住民運動公共關係中的一環，分析原住民運動中幾個重要議題的相關書寫作品，並從分析中得知，原住民報導文學書寫者常是站在運動者或行動者的立場來進行書寫，此外，論文利用後殖民理論中幾個重要的指標概念，如混種(hybridity)、融合(syncretism)、流離(diaspora)等與遷徙、跨越和邊界等隱喻，與原住民運動中的認同、族裔等概念對話，探討這些觀念與時代變遷的關係，至於作品內容的分析，計有131篇，採數據、表格量化、交叉分析等方法，顯現一定的思辨力與解釋力。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這部論文在議題選定、研究方法上都有後出轉精的出色表現。

以上八部學位論文，有的全景綜論，多面考察，有的精選議題，深入辨析，涵蓋了報刊雜誌、原住民題材、文學獎現象與兩岸異同的比較等，相對於之前理論批評的散文化、作家化，逐漸走向學術化、學人化，研究的質與量都有可觀，對現象的總結與理論的深化，使報導文學研究進入新的境界，這些年輕研究人力的加入，將可充實和壯大台灣報導文學的研究隊伍，加速拓展報導文學理論批評的空間。

在深化期這個階段，另一個突出的指標是大型報導文學研討會的舉辦。佛光人文社會學院文學所陳信元教授是主要的推手，在他的規劃下，分別於2001、2002年舉辦了兩場「兩岸報導（告）文學的發展與未來研討會」，分別邀請了包括張鏗、周明、李炳銀、陳祖芬、張勝友、喬邁、長江、涂懷章等大陸報導文學作家來台，和台灣學者作家陳映真、陳銘礪、古蒙仁、黃春明、李利國、楊樹清、陳光憲、須文蔚等人進行學術交流，別具意義。2001研討會集中探討了兩岸報導文學發展歷程、創作特色及發展趨勢等課題，2002研討會則以作家自身創作經驗交流為主，同時也暢述了對報導文學的認識、憂心與期待，兩岸學者對報導文學這個文體都表現出高度的關切與使命感，相互激盪的思想火花將可為未來更具規模的學術交流、理論切磋奠定良好的基礎。在2001研討

---

在典型美有較為突出的藝術追求。」類此的見解多是符合實情的精準評價。這部論文由張素貞教授及筆者共同指導。



會上，陳映真應邀演講〈台灣報導文學的歷程〉，全文後來在《聯合報》副刊發表，對台灣報導文學自楊逵開始提倡的發展歷程，做了具個人觀點的理性回顧，特別對七〇、八〇年代的分析以及《人間》角色的定位等，言之有據且獨到深入，結尾對報導文學的瓶頸與生機也有深刻的建議，作為台灣報導文學發展過程中的「參與者」與「倡導者」，他的觀察總能抓住此一文體與時代變遷的脈動。

這個階段和陳映真的文章同樣具有理論價值的還有：陳光憲的〈論報導文學的樣式〉（《台北市立師院語文學刊》第4期，2000年6月）、〈論報導文學的時代性〉（《語言文學之應用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0年11月）、余昭玟的〈當前的報導文學與《史記》〉（《中國現代文學理論》季刊第18期，2000年6月）、顏秀芳與傅榮珂合撰的〈陳銘礮報導文學之研究〉（《嘉義大學學報》第74期，2003年4月）、向陽的〈擊向左外野——論日治時期楊逵的報導文學理論與實踐〉（《台灣史料研究》第23期，2004年8月）、王文仁的〈從「幌馬車之歌」看藍博洲的報導文學創作——兼論台灣報導文學的幾個文類問題〉（《東華中國文學研究》第3期，2005年6月）等幾篇學術論文。陳光憲的兩篇論文並不全然針對台灣報導文學，而是概論此文體的時代性、特質、興起與樣式，蒐集諸家的說法，仍屬鳥瞰似的述介，但其中也提及台灣報導文學。所謂「樣式」，包括了題材與寫作手法、呈現方式等，共分成六類：危險的文學樣式、重現史實的樣式、災難報導的樣式、歌頌英雄的樣式、弱勢關懷的樣式、環境保護的樣式，和已有研究成果的說法並無太大出入。余昭玟的論文仍是為高信疆早期的源流說下註腳，分從以下四個角度立論：作者的基本修養——實地考察，多聞闕疑；描繪人物的藝術——開展視野，傳神寫形；歷史的深度——鑑往知來，歷久彌新；文學價值的提升——善用想像，辨而不華。以這四點來論證《史記》堪為報導文學的典範。

至於專論陳銘礮、楊逵、藍博洲的三篇論文，都能言之有物、論證有據，展現了學院訓練的一定水準，理論的深度與思辨的力度都能代表這個時期的研究水準，尤其是向陽試圖釐清楊逵的「報告文學」理論與中國左翼「報告文學」無關的論述十分精采，他指出：「作為左翼作家，楊逵不是教條主義者，他的心中存在著作為讀者的大眾，也為作為大眾的讀者而寫。他的提倡並從事報導文學創作，是在這樣的理論基礎上出

發，而非全然為了政治與階級鬥爭。」因此，與同年代中國左翼作家的「報告文學」並非同源，也找不到與中國左翼作家或批評家類同的用語或語境。他認為楊逵之提倡「報告文學」，主要是「受到日本媒體、批評家的啟發」，同時在美學、方法論、目的論上，都比較接近馬克思、恩格斯的文藝美學理論。他的結論揭示了楊逵理論的重要性與特殊性：「他的『報告文學』論述無一字及於階級鬥爭，只強調『從眼前、從周遭』寫起，以真相為念、以大眾為師、以歷史為鑑；同時強調媒體的傳播與運用——在這個部分，『報告文學』因此也被他當成提升台灣文學水準、深化台灣文學大眾化的工具或技藝。他的『報告文學』書寫與理論的倡議，從這個部分來看，更靠近台灣的土地和大眾，更具有鮮明亮燦的『台灣味』。這是他的『報告文學』理論最特殊之處，也是日治年代台灣報導文學與當時的中國報告文學最殊異之處。」<sup>33</sup>在楊逵談報導文學的史料「出土」之後，向陽此文堪稱是最具深度的一篇論析文章。

學位論文的相繼投入研究，大型研討會的舉辦（可惜只有兩屆），加上學院中不少學者兼具犀利文采與獨到洞見的理論文章，新世紀的開始，報導文學研究已經累積了卓然可觀的成果，對報導文學理論批評的許多重要領域都有深入的探索，可以說已為報導文學文體理論的發展構築了一個雛形的框架。除了陳映真、陳銘礪偶有相關文章發表，這時期的研究人力幾乎都是學院內的學者，如果他們願意持續、專注於這個領域研究的細化、深化工作，則新世紀報導文學理論的向前發展才能樂觀期待。

## 六、結語：問題的呈現與可能性的提出

對於「報導文學」這個似已漸失舞台、卻又尚在成長之中的年輕文學樣式，在寫作方面，它所遇到的困境與瓶頸，已經透過許多學者的研究分析得出一定的共識，包括：文類定義的模糊不明、媒體應用性的過度干涉、意識形態的僵化牢固、題材的未能推陳出新、媒體氾濫下影像

---

<sup>33</sup> 向陽（林淇濱）：〈擊向左外野——論日治時期楊逵的報導文學理論與實踐〉，《台灣史料研究》第23期，2004年8月，頁148。

取代文字、新生代的參與意識低落等<sup>34</sup>。和向陽一樣長期研究報導文學的須文蔚，在 2002 年時與向陽共同編選了《報導文學讀本》，這是繼陳銘礪《台灣報導文學十家》後的第二個選本，書前由須文蔚執筆的長篇導論〈再現台灣田野的共同記憶〉，是一篇立論札實、角度多元，同時又有自己立場的文章。在文中，他也指出台灣報導文學長期以來所面臨的瓶頸與迷思有三：一、強調報導的絕對客觀化；二、過度表彰「學術化」的書寫框架；三、忽略散文以外的文學體式。針對這些困境，他提出報導文學的「鬆綁論」以去除迷思，具體的作法有四：一、主張報導文學的任務是「再現」田野，「借用新聞寫作的聲調，但是讓報導文學『姓文不姓新』，回到文學傳統中。」；二、回歸「實在的文學」的報導傳統，鬆開「學術化」書寫框架的限制；三、採用散文以外的多元化文體，但內容仍以紀實為主；四、等待更多來自現場的聲音，「相信只要社會運動不停歇，人文關懷不停歇，報導文學工作者就有豐厚的田野可投身。」<sup>35</sup>如能朝這個方向努力，展望新世紀的報導文學書寫，他認為實不必悲觀。對於報導文學的作者與讀者來說，或許只有這樣寬容、鬆綁、開放與多元的態度和視野，才能重新喚回上個世紀曾有過的高亢熱情與潛藏的活力。

至於在理論研究方面，筆者以為，至少有四個困境是必須面對的：第一、文體定義、本質、特性的莫衷一是，導致研究者各說各話的混亂，這個問題存在已久，而且是所有研究者無法迴避卻又感到棘手、不易釐清的難題。楊樹清 2001 年在為《台灣報導文學概論》寫的序中說：「報導文學的文類歸屬、『報導』與『文學』的定義，卻依然未有定論。」而陳映真在 2001 年的演講〈台灣報導文學的歷程〉中也有相同的憂慮：「一直到今天，報導文學的定義、報導文學的歷史發展過程、報導文學的特色、世界和中國重要報導文學作家論和作品論等，至今還十分混亂、空白，往往在課堂上教報導文學的教師、報導文學徵文評審者的認識都言人人殊，甚至還分不清楚報導文學與一般其他形式文類的文學的差別、分不清楚報導文學與一般新聞寫作的差異……這問題是比較嚴重

<sup>34</sup> 參見張堂錡：〈台灣報導文學發展的困境〉，《空大學訊》第 242 期，1999 年 11 月，頁 47-51。

<sup>35</sup> 以上須文蔚的說法引自〈再現台灣田野的共同記憶〉，《報導文學讀本》（台北：二魚），頁 32-39。

的。」第二、方法論的欠缺。這個問題高信疆很早就揭示，他提出史學、社會學、人類學的田野調查；鄭明姍提出文學與新聞的科技整合，楊素芬則提出新聞學、歷史學、田野調查、照相攝影等方法，須文蔚曾提出民俗誌、社會運動，這些方法論的進一步整合歸納與分析，也是當前必須著手的。

第三、典範性力作的缺乏。理論來自經典文本，但「廣為讀者所難忘的典範性力作」、「引人注意的、長篇報導文學作品」，陳映真認為尚未出現，而大陸上「有定評的報導文學傑作」卻多不為台灣所知，導致「對報導文學十分缺乏感性的、思想的和審美的體驗。」<sup>36</sup>不必諱言，即使是七〇、八〇年代具代表性的作品，今天看去，不論在語言、結構、思想、技巧、風格等方面都仍嫌粗糙、平面、單薄，離經典性的作品還有一段不小的差距，這個存在的事實，導致文學史對報導文學有意的忽視<sup>37</sup>。報導文學雖然只是「次文類」，而且很長一段時間是邊緣性文體，但它曾經存在的影響與文學意義，和文學史的對待卻是不相稱的；第四、研究人力的不足。正如向陽的感慨：「台灣報導文學最主要的困境是沒有寫手。寫作者的生活無法受到保障，也沒有地方發表。」<sup>38</sup>在研究方面也面臨同樣的困境。目前這一領域的研究者以碩士研究生居多，李瑞騰、陳光憲、向陽、須文蔚等早期的研究者已經成為新一代研究人力的指導者，雖然他們偶有相關研究成果，也具備進行系統理論研究的

<sup>36</sup> 本小節中所引陳映真的說法均見其〈台灣報導文學的歷程〉一文。

<sup>37</sup> 葉石濤的《台灣文學史綱》，在談七〇年代文學時，只有鄉土文學，完全不提報導文學，而談八〇年代的文學時，也不提《人間》雜誌，寧可介紹大眾文學，也無一字論及報導文學，彷彿並不存在。而據台灣文學史的研究者與寫作者陳芳明教授向筆者表示，由於在審美意義上台灣報導文學缺乏出色的作品，他也只能簡要提及有此寫作風潮，但不會多加介紹。大陸上也存在類似的情形，但原因不盡相同，主要是研究者仍有文學定位的困惑與考量，認為這只是「亞流」而有意忽視。大陸報告文學研究者尹均生就指出：「最近出版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洪子誠著）和《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陳思和著），被視為當代文學教材的權威之作，教育部認定為全國教材，其中寧肯對『朦朧詩』、『先鋒小說』闢專章論述，而對報告文學僅在行文中以數行文字帶過……這裡有意的忽視也是頗為明顯的。」，見尹均生：〈報告文學理論的形成、拓展與前瞻〉，《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02年第1期，頁31。

<sup>38</sup> 向陽的說法見詹宇霏：〈刻畫黑暗的臉——「從災難看報導文學」座談會紀錄〉，《文訊》雜誌第245期，2006年3月，頁85。這場座談會於2005年12月23日舉行，由台灣文學發展基金會主辦，《文訊》雜誌社等執行，由李瑞騰主持，大陸報告文學作家錢鋼和台灣學者、作家林雲閣、楊渡、向陽、阮桃園與會。

能力，甚至於可以期待他們寫出內容豐富、涵蓄中外、理論體系完備的學術專著，但因著種種原因，這樣的期待終究落空。相對於大陸上自八〇年代初在中國社科院新聞研究所招收第一代報告文學研究方向的碩士生起，至今已培養出二十多屆碩士生，蘇州大學還培養了首屆博士生，我們的研究陣容、梯隊都尚未達到成熟的階段。研究人力的單薄，與報導文學的學科化尚未完成直接相關。根據許多學者的看法，一門學科的確立應有三個標誌：一是要有專門的學術園地；二是要能登上大學講壇；三是要有全國性的學術組織。這三個條件，除了第二項部分實現外，其餘均遙遙無期，而大陸上在八〇年代末就已具備。組織、課程、發表園地的不足，使報導文學難以成為研究者持之以恆的學術標的。

看來，不管是創作還是研究，台灣報導文學都陷入了難以克服的困境中。大陸報告文學作家錢鋼於 2005 年底應邀來台訪問一個月，他在一場座談會上很訝異地表示：「報導文學卻不見了，我想問的是報導文學去了哪裡？」，而主持人李瑞騰的開場白是：「國內報導文學似乎式微久矣。」<sup>39</sup>創作的式微直接影響的是理論的貧乏，只有質量俱豐的作品才有理論的說服力。面對新世紀的報導文學研究，若要突破或成長，必須寄望於創作的突破與成長。在「起步」之後，更困難的是「起飛」。「起飛」需要許多條件的成熟，例如：在從事報導文學的理論批評時，擁有自身的學術操作話語，有學者就建議不妨用「非虛構性」取代「真實性」，用「可傳播性」取代「文學性」等<sup>40</sup>，類此的術語革命值得思考；研究方法的理論參照應該深化，除前述一些理論的借用外，西方敘事文學理論、文藝社會學等，都可以運用以強化這門學科的廣度和深度；對報導文學理論的體系建構，也是這門學科擺脫「起步」邁向「起飛」的重要標誌，如報導文學的創作特徵、審美規律等都應該作體系性的闡論，中外經典報導文學作家與作品也要進行理論上的總結，如何將報導文學這種特殊的文類納入整個文學系統，如何從全球化視野審視台灣報導文學的生存與發展等，都需要報導文學理論工作者去開拓，去探索。這些可能性的存在，正意味著台灣報導文學研究的空間尚待開拓，期待不久的

<sup>39</sup> 同前註，頁 81、82。

<sup>40</sup> 參見丁曉原：《20 世紀中國報告文學理論批評史》（安徽大學出版社，1999 年 12 月），頁 18。

來日，《台灣報導文學發展史》、《報導文學寫作理論》、《報導文學文體學》、《報導文學文藝學》、《報導文學美學》這一類體系化研究的專著得以出版，因為，只有這些著作相繼完成，報導文學的學科化工程才算是擺脫了稚嫩、起步的階段。

回顧這段報導文學發展的歷程，令人百感交集，因為許多問題至今仍未解決；前瞻報導文學在台灣的未来發展，則令人難以樂觀，因為還有一段漫長的路要走。正如向陽所說，報導文學的功能是「呈現以及提出」，而非解決問題，作為一個研究者，筆者也只能同樣遺憾地試圖做到「呈現以及提出」，許多問題的解決，必須更有耐心地，等待更多創作者、研究者的投入才能克竟其功。【責任編校：簡名宏】

## 參考書目

### 專著

- 陳銘礪，《現實的探索》，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80年4月  
彭小妍主編，《楊逵全集》，台南：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  
2001年12月  
楊素芬，《台灣報導文學概論》，台北：稻田出版公司，2001年9月

### 期刊論文

- 李瑞騰，〈從愛出發——近十年來台灣的報導文學〉，《文藝復興》月刊  
第158期，1984年12月  
林耀德，〈台灣報導文學的成長與危機〉，《文訊》月刊第29期，1987  
年4月  
林淇瀟，〈擊向左外野——論日治時期楊逵的報導文學理論與實踐〉，《台  
灣史料研究》第23期，2004年8月  
陳光憲，〈論報導文學的樣式〉，《市立師院語文學刊》第4期，2000年  
6月  
陳映真，〈台灣報導文學的歷程〉，《聯合報》第37版副刊，2001年8  
月18日-20日  
須文蔚，〈報導文學在台灣（1949-1994）〉，《新聞學研究》第51期，1995

年 7 月

劉捷，〈關於報告文學〉，《台灣文化》月刊第 2 卷第 2 期，1947 年 2 月

鄭明嫻，〈報導與文學的交軌——報導（告）文學初論〉，《當代文學氣象》，台北：春暉出版社，1988 年 4 月

鄭梓，〈二二八悲劇之序曲——戰後報告文學中的台灣「光復記」〉，《台灣史料研究》第 9 期，1997 年 5 月

### 學位論文

吳薇儀，《兩岸當代報導文學比較研究（1976-2004）》，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年 6 月

劉依潔，《「人間」雜誌研究》，東吳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 年 7 月

### 審查意見摘要

#### 第一位審查人：

台灣報導文學理論研究向來是學界較薄弱的一環，本文在前人有限的研究基礎上，爬梳資料，加以系統論述，並具體將台灣報導文學研究分期，進行回顧式的檢視。整體而言，對前人的研究都能深入剖析，論其得失、特色，並提出未來的研究方向。以下提出兩個問題供作者思考：

- 一、本文提到 1930、1940 年代，楊逵、劉捷都曾撰寫報告文學的文章，也強調與中國同時代的報告文學有所區別。楊、劉二人對「報告文學」的認知，是否來自日本？或日本翻譯自西方的理論？
- 二、1960 年代對「報導文學」的看法為何？報導文學得獎作品是否都符合「報導文學」的定義？這個年代的「報導文學」與 1930、1940 年代的「報告文學」，在理論與創作上有何不同？

**第二位審查人：**

本文針對半世紀以來台灣報導文學論述的生發、沿革與研究現狀，根據作者蒐集的豐富文獻與資料，進行堪稱縝密的爬梳與探照，提供讀者清晰的台灣報導文學創作與論述地圖，有助於後續研究者在此一基礎上深耕，強化台灣報導文學理論的建構。就當前此一領域而言，具有澄濁清源、斟酌輕重的參考價值。

作者對於此一領域的生態具有高度掌握能力，因此本文在史料和文獻、論述和研究之間，均能相互呼應、印證；更重要的是，本文在論述過程中，劃分理論研究的階段、提出不同階段的論述特色，評價台灣報導文學的已然、應然，呈現作者對於台灣報導文學理論論述不足的可貴分析，他提出的四個困境說，為過去研究者所未能發，具有創見，所指台灣報導文學理論建構應深化的方向，亦屬可行。